绪 论

“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纪念日。60年前,由那时开始了为期八年的艰苦抗战,军民死伤三四千万。年过50岁的中国人,几乎每人都受到那场战争的影响。“七七事变”是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后想吞并中国的一个步骤。当时保卫平津、河北、察哈尔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以一个装备简陋的地方部队来对抗有组织、有训练与处心积虑的强大日本军队,当然是十分困难的。然而现今日本某些人与一些出版物中,竟有“七七事变”是偶然发生的说法,并有些人说那是中国人首先开枪制造出来的。这些日本人的狡辩与日本有些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同出一辙。这只让我们更深的了解,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仍然猖狂。纪念“七七事变”最大的意义是不忘这段历史的惨痛教训。

甲午战争时,中国各省、南北洋舰队各自为政,腐败的清政府被日本一击就订了城下之盟。“九一八事变”时军阀割据,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东三省丢失予日本。日本再发动“七七事变”,妄想分割华北而蚕食中国。以一个地方部队的二十九军能够阻止日本各方面的威胁利诱、捣乱、策反来履行军人保卫国家的职责,实令我们后人由衷敬佩。

二十九军本是由西北军残余而组成的。1927年北伐成功后蒋介石为铲除异己,裁减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部队而导致1930年的中原大战。失败后的西北军被编成第二十九军。“七七事变”前它在日本人与蒋介石的夹缝中挣扎着维持生存。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二十九军当然是被日本人玩弄于掌股之间了。要战要和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由东京决定，再加上日本依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处有驻军的权利，二十九军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同时,日本更积极培植‘ 以华制华 ’的地方傀儡,诸如支持石友三、白坚武成立‘ 华北国 ”,支持殷汝耕成立‘ 冀东反共自治政府 ”,还利用汉奸挑拨离间二十九军将领中的矛盾，使张自忠逼走了宋哲元，并下令北平的阮玄武与石振纲二旅缴械，而侵占平津。这些都是日本侵华的真凭实据。

现今帝国主义仍是虎视眈眈。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帝国主义则不敢伺机而入，施行其分化与侵略的伎俩。

本书收集引用各方面原文时，尽量不加修改，务求真实，以供参考。因此各文章之间，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希望以史为鉴，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以共御外敌，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第一章‘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

一、日本占领我东北后对华北的步步逼进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称霸亚洲，跻身于世界列强，它把向外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中国。

早在 19 世纪末,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的侵略中国理论。1927 年《田中奏折》中也说得非常清楚:“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几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就沿袭着这条对外扩张侵略的“大陆政策”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活动:1879 年吞并琉球群岛;1894 年为侵略中国而挑起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北洋军队全军覆没。 1895 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夺去了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并索取了大量赔款;1900 年参与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兵权和其他权力； 1914 年趁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借口与英国有同盟关系对德宣战，但并未去欧洲参战，而是夺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1915年又趁袁世凯称帝之机迫使其接受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继之多次干涉中国内政,挑唆中国军阀混战,从中牟利,先后制造了上海、青岛、济南等地惨案和‘大沽口事件”;1931 年为了先‘征服满蒙’而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全力进行对东北的侵占和建立殖民统治,但其军事进展不是顺利的。尽管英、美、法等国对中国推行

靖政策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是其进兵的有利条件，然而却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全国军民决心与日本决一死战，国联也提出限期要日本撤兵。为了转移中国朝野视线，牵制退居平津一带的东北军收复失土，对抗国联撤兵决议，1931 年 11 月间，日本在天津制造了一起便衣队的暴乱事件。天津是华北经济中心，中国北方工商业大城市，又有各国租界。因此，天津一有暴乱，即波及华北、震撼中外。暴乱结果，日本的目的一一达到了，是年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日本只能建立由其绝对控制下的所谓“独立国家”的傀儡政权，即成立独立的‘满洲国’。此举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欧美列强也对其势力膨胀加以指责。日本为了把外国的注意力引开，使‘满洲国’容易独立，又策划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和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是当时中国首都南京的屏障，是沟通半个中国政治、经济、东西交通大动脉长江的咽喉，是蒋介石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石。上海还是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基地。所以在上海点火既可迫使蒋介石屈服，又可使欧美各国为其在华利益计，只好牺牲在中国的局部利益促成中日妥协。果然，正当上海热战方酣，中外朝野热衷于调解之时，日本就于 1932 年 3 月 9 日在长春暗地里使‘满洲国’独立起来，宣布溥仪为‘满洲国’的‘执政’，郑孝胥为‘总理’，并举行了就职仪式，于是‘满洲独立’成功了。

“满洲国”一出笼，日本就同其签订条约和协定，藉此对东北加以控制。1932 年 3 月 10 日，双方达成的密约中，‘满洲国’把整个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主权都出卖给了日本，使日本成了“满洲国”的统治者和太上皇。9 月 15 日，日本还演出了承认“满洲国”的丑剧，并于当天又签订了所谓《日满协定书》，用条约的形式将东北一切权利控制在手。不仅如此，还规定“满洲国”政府及其各

部,必须由日人任顾问和次长,他们拥有‘不同意’的否决权。可见独立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的附庸而已。根据‘条约’或‘协定”,日军与警察、宪兵、特务遍驻东北城乡,对东北人民进行血腥的殖民统治和镇压。

日本对东北经济的殖民统治,主要是通过“满铁”和其他侵华财团,如三菱、三井、大仓、东植和住友等进行。这些经济侵略机构分别把东北的工业、农业、商业、矿产资源与交通事业控制在手。

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日本极力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日语化,共荣化,职业化,灌输‘日满亲善’‘王道乐土’‘顺天安民’等亡国奴思想。

日本在东北刚建起殖民统治后,就急不可待地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是有其政治、军事、经济目的的。华北地处中国腹地,将其侵占,东可确保‘满洲国’安全,使日、“满”、华联成一体,共同防御苏联扩展赤化的特殊地区;西能扼制西部各省;北不战可得内蒙;南可进击长江流域威胁当时中国首都南京,至少可侵占中国半壁河山。总之,要把华北变成吞并全中国的基地。

华北的人口、购买力均为东北所不及,因而是倾销商品的最好市场。而华北的农产和矿产资源更是东北所不能比,其中尤以炼钢用的优质无烟煤、含铁量多的铁矿石和得天独厚的长芦盐为佳,产量大、质量优。这些取之不尽的战略物资和工业发展的原料是日本急需物资。所以,华北被日本视为‘第二条生命线”。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说道:“日本如果不能控制平津地区,占有重要的平绥铁路,并支配北平西北察绥两省四百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的铁矿区域,将无法安心。而且,除非日本控制了黄河以南的全部中国领土,平津地区就不能安全。”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就华北对日本之重要性讲得更为露骨,他说:“发动对满洲战争而占据之(东北),一时帝国市场与原料得稍缓和,然而尚有若干原料问题不能解决于满洲……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期间亦难再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扩大，即不能与帝国生产率之增进相调和。帝国为确保满洲并使其安全，不能不努力满洲边界地区之缓冲设施……然则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视于进攻中国的华北……故华北诚我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这就清楚地看到日本之所以要急于入侵华北的目的。同时，还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对“满洲国”的承认。

1932年6月以后，日本在“领土完整”“国防安全”的叫嚣声中，声称热河是“满洲国”的领土，相继攻占榆关、热河并纳入“满洲国”版图，接着举兵西侵和南犯，揭开了入侵华北的战幕，步步向华北逼进，长城各口便成了日军攻击的目标。中国守军在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纷纷撤退，使日军得以越过长城进逼平津，前锋侵达塘沽、通州，大有攻占平津之势，中国政府被迫与其签订了中日《塘沽停战协定》。

中日《塘沽停战协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协定，是个战败国臣服战胜国的投降协定。《协定》中的所谓日军“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一词，便意味着“长城一线”是“满洲国”的“国境线”了。长城以南等地区规定为“治安维持区”即“非武装区”。这个“非武装区”日后就成了日伪军出没华北，制造事端与日朝浪人走私贩毒的场所，为日本入侵华北洞开了门户。《协定》签订之后，日本便逼迫中国政府与“满洲国”实现了通车、通邮、设关通商的三通要求，从而使中国政府在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

日本入侵华北之初，其兵力和国力是不足以直接用武力侵占华北的，又何况欧美列强亦难容忍他们的利益在华北丢失，而中国人民多次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又给日本侵略者以当头痛击。所以，日本在中日《塘沽停战协定》后对华北的侵略采取以军事威胁，政治讹诈，外交哄骗，经济侵略等一系列的手段，逼迫中国政府把冀察平津两省市的军、警、宪、特大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使日本势力深入冀察平津。

日本势力控制冀察平津后，竭力对华北进行分裂活动，企图在

华北建立起第二个“满洲国”式的傀儡政权——“华北国”。其策略是：高唱“中日两大民族共存共荣”“日华亲善合作”“东亚和平”极力推行“分而治之”“以华制华”的手法，明着倡导华北民众“自治”运动，暗地里却干着“策反暴乱”。实际是要华北五省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脱离南京中央政权而独立。为此，先后对华北地区的实力派、亲日势力和某些朝野军政要人，如段祺瑞、吴佩孚、于学忠、孙传芳等人进行策反，阴谋筹建华北地区的“独立”。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国政局和国际形势的骤变，建“华北国”的阴谋破产，最后只得发动“七七事变”以达到其目的。

二、日本在华北的扩军备战

日本入侵华北和分裂华北的目的是为了在华北建起北攻苏联南灭中国的跳板与基地，所以他们必须在华北地区积极进行扩军备战。在冀东伪政权出现后，日本的备战活动更明目张胆地进行。

日本在华北的扩军备战，一是物资上的备战，二是军事上的备战。

物资备战。日本推行“以战养战”的战备政策，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主义掠夺方针，在所谓“平等互惠”“经济提携”外衣的欺骗下，对华北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与掠夺。在天津成立了各种调查华北农业矿产资源的组织机构。例如其中的“兴中公司”制定的《华北重要资源经济调查方针及要项》文件中，就明确提出了要实现“使战时我国(指日本)国防资源易于补充”的要求。为此，日本在华北各地，尤其在平、津、青地区陆续兴办、扩建了大批公司、企业和工厂。这批日本企业对中国的各项工业、商业、交通和农副矿产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渗透，用投资、贷款、合办、扩建、自建、收买等方式操纵或垄断了津、青地区的经济命脉。如垄断了华北的棉花市场，强划冀东几万顷土地作“植棉场”，控制了华北电力供应

系统，操纵了机械、交通企业，强占了龙烟等煤铁矿，等等。总之，“七七事变”前的华北，尤其平、津、青三市的重要企业多操纵在日人手中。不仅如此，日本每年还从华北掠走了大量的煤、铁、盐、棉、石油、羊毛等各种战备物资和农副产品，以供战备和工业发展之需。以盐为例，1936 年底掠走 7 万吨，翌年 25 万吨，足见日人对华北资源掠夺之惊人。

军事备战。首先，强化并完善作战的军事组织机构和指挥系统，天津驻屯军扩编为华北驻屯军，成为与关东军并驾齐驱的军事单位，司令官同由天皇任命，兵力按三个师团建制，承担侵华指挥任务。1936 年前后，日军大批入关，到年底增加到一个师团，连同在华北潜伏的日本浪人和汉奸队伍，总兵力达到近三万人。所增之兵力多由日本国内各师团抽调的精锐部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兵种亦较齐全，一般备有骑兵、炮兵、守备兵、坦克兵、航空兵、化学兵、机械兵和汽车兵等。

华北驻屯军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前线指挥中心，因此驻津总领事馆及其华北各地的领事馆奉命与之密切配合，关东军在华北各地的特务机构亦归其节制，天津警察总署及各地分署受其管辖。总之，日本在华北的一切侵略机构和人员统由华北驻屯军统率，并迅速地将机构扩编，人员倍增，从而充实和完善了侵华机器。

其次，是对华北陆、海、空交通网线加以控制。日军大批入关后，即沿北宁、平津、平汉、平绥等铁路交通网线驻扎，强占有利地形和军事要冲。中日《塘沽停战协定》又为日本控制辽东半岛至华北沿海的海上交通提供了条件，日舰以该《协定》为由，在渤海海面任意游弋和出没华北沿海口岸，从而掌握了海上交通。为了战事运输快捷，日本在大沽口增建了海军码头，积极扩建塘沽新港，筹建津石等铁路，在塘沽设立了内河运输公司，控制了河北内河航道。通过《中日华北航空协定》的签订及天津“惠通公司”的成立，华北的航空权就为日本所控制，日机任意飞行华北上空和在华北机场

结集,还同日本本土与‘ 满洲国 ’组成联航。

同时，在华北修筑各种军事设施和战斗工事。如在平津等地新建和扩建机场，筑工事，造营房，建军事仓库，设军事通讯网线等，长途电话和无线电报遍及华北各省市，同东京、长春各备有直达线路。

军事演习频频举行。从‘ 九一八事变 ’到‘ 七七事变 ’的五六年间，日本在华北的军事演习数百次。其规模越来越大，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参加人数越来越多，以夺取中国城市为目标的演习越来越明确。在数百次的军事演习中以 1936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4 日的所谓‘ 秋藻 ’演习规模最大,驻华北的日军几乎全部出动,而且竟以夺取中国平、津两大城市为演习目标。陆海两军的联合演习也时有举行,如 1934 年 8 月间陆海两军联合演习,14 艘军舰在大沽口外炮声隆隆，榆关、天津两地的陆军演习枪声密如雨点，配合默契。海军的单独演习以 1937 年的 3 月间，由前海相永野海军大将率领的大小 70 余艘的联合舰队在胶州湾海面的演习最为突出。这不仅是武力威胁，而且是为占领中国做准备。

三、日本侵吞华北的阴谋活动

“ 九一八事变 ”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侵吞华北,变成由其控制下的第二个‘ 满洲国 ”,采取了多种多样的阴谋活动。

（一）成立特务间谍组织，刺探情报，组织暴乱

日本在华北专门收罗了一帮不得志的军人政客、地痞流氓、三教九流等中华民族的败类,组成‘ 第五纵队 ”,为其侵华政策摇旗呐喊、充当打手,并策动他们在华北进行暴乱、颠覆和分裂活动。这些特务组织大部分设立在天津的日租界。计先后有：

“同文俱乐部”：这是由亲日分子方若在日本驻津总领事馆指使下于 1914 年成立的，专门网罗我国朝野要人、巨贾及土匪流氓等的特务组织，活动十分猖獗。

“三同会”：它是由“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生同学会”“中日同道会”三者在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部的捏合下建立的。其活动受天津驻屯军的指使。

“中日佛教研究会”：这是个披着宗教外衣，网罗下台的军人政客，鼓吹“中日亲善”，制造侵华舆论，鼓动华北分裂的特务组织。它由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石井嘉惠所操纵。

“普安协会”：是日本“黑龙会”分子小向日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三野友吉串通原天津《大公报》采访主任张逊之、大流氓袁文会，以及原直隶督办公署军警督察处处长厉文森建立的一个封建性的特务组织。这个组织又网罗了一大批地痞流氓、帮会、恶棍、无业游民，专门秉承日本特务机关的旨意，收集情报，散布谣言，冒充“民意”团体，聚众闹事，扰乱社会，鼓吹卖国论调，为日本侵华制造干涉理由。

“青木公馆”：隶属关东军领导，日军大佐大造通贞主办，专门从事策划华北伪政权的建立。殷汝耕冀东伪政权的出笼，“华北自治运动”的出现，敦促吴佩孚出山建立“华北国”的企图，均系该组织所为。

“茂川公馆”：它网罗了大批下台军人政客和土匪，负有配合日军侵略华北摇旗呐喊的使命和在日军占领地建立傀儡政权的任务。天津沦陷三天后，以高凌蔚为会长的汉奸组织“维持会”的出现，就是这个“公馆”干的。它还在八里台设有专门搜集南开大学抗日活动和附近中国驻军情报的“南开农场”，以及专门搜集英、法租界情报的“同乐京剧社”。此外，它还收买了天津《庸报》，后来该报成了为日本侵华大造舆论的喉舌。所以，这个组织是日本在华北的各个特务组织活动中最为猖獗的一个。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华北各地都有为其驱使的“第五纵队”出现，特在华北各地派驻了特务机关。这样，除天津外，关东军在北平、通县、保定、唐山、济南、青岛、太原、归绥、张家口等城市都设立了特务机构，并派少佐、中佐、甚至大佐的军官担任机关长，从而使“第五纵队”布满了华北各地。这些特务机关是专门从事搜集中国情报，策动叛乱的。不仅如此，1933 年间日本特务机关还唆使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三野友吉有特殊关系的白坚武等人在沈阳成立了专门从事联络在职和下台军政界内的亲日分子，以建立“华北国”为宗旨的反动组织——“正谊社”。

日本帝国主义除了设专门特务机构，建立‘第五纵队’外，还建有以企业为幌子进行特务活动的斋藤、鉴村、迩宫等洋行。这些洋行都是以经营商业、贸易为名，干特务勾当的企业。如斋藤洋行就担负了对东北沦陷后由东北来津的军政界人物的拉拢工作。

原北平市公安局存有密探所获的日本特务、间谍组织刺探情报、组织暴动等报告，现摘录部分如下：

①1936 年 5 月 19 日

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近在天津秘密组织便衣队八十余名，委华人许有志为总队长，专任刺探华方军事及学校行动，许某曾于数日前来平与日使馆馆员鹿子田充接洽，拟将此批便衣队化装来平，指派以相当任务。

②1936 年 6 月 17 日

北平东交民巷某驻军旅团长，近派密探多名，前往冀察平津省市管区内侦察驻军实力及武器、教育情形。闻向平绥津浦各路沿线出发者，已有七起。

③1936 年 12 月 24 日

殷汝耕近派王仲元赴津，在日租界组织机密队五队，每队十一人，现已招有 30 余名，拟分发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及平浦沿线等处，调查我方军队、军械数目、驻地及主官姓名等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④1937 年 4 月 27日

某方以伪冀东政府名义成立密探队，侦察我方军政情况。所有北平文武机关科长以上官职住址、自用汽车号码均行秘密调查。

凡各汽车商行现有汽车数目、车辆种类，亦皆详加记录，更对官署差役、职员及高级官长私宅男女仆人，如被辞散，彼方亦将设法收容，或用金钱贿买机关职员，以便摸透我方军政情况。

⑤1937 年 5 月 7 日

近由关东军派情报处长掘原来平，与外人黄慕、婴井等联络，共同组织情报处，其总机关设在东交民巷特务机关内，专收容中国可靠之青年汉奸，施行间谍工作。现已收罗中国青年 20 余人，另有日本青年 25 人。

⑥1937 年 7 月 9 日

某方近由伪满文教部选派汉奸 30 名，于本月中旬前来华北投考学校，分布于平津保察绥等处，目的在调查各省市学校内部组织情形，及抗日分子之活动，与华北共党之近况。

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华北国”，所使用的一种特殊的侵略手段是策动“第五纵队”进行暴乱。

首先策动了天津便衣队的暴乱。这一暴乱，是由日本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与在天津的日本大特务三野友吉的配合下，伙同天津日本驻屯军共同导演的。日本帝国主义包藏祸心在天津策动这一暴乱决非偶然。这是由于天津有日本驻屯军、领事馆和大批特务组织，策划与指挥能力较强，有“第五纵队”招之即来，还可以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把东北军牵制在关内，转移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以津变为由，保侨为名，使日本在东北继续用兵。天津是华北的军事重镇、经济中心、北京的门户，如有动乱将波及整个华北，为日军侵略华北制造口实。如果暴乱得逞，可以打击张学良、王树常、张学铭等将领在东北军中的威信，迫使东北军放弃收复失地的打算而动摇军心。

基于以上各点,日本帝国主义便指使张璧、李际春、袁文会、郝鹏、石友三、白坚武等人和一大批地痞流氓、白面鬼等社会渣滓,在土肥原和三野友吉等人的策动下，用着日元，拿着日制枪炮，在日军的尾随下,1931年 11 月 8 日和 26 日先后两次从日租界冲向中国地界,袭击天津市的党、政、军机关,谋夺权力,抢夺民财,屠杀百姓，炮击民房，给天津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这帮乌合之众的“第五纵队”,遭到天津保安队反击,狼狈逃回租界。败北的便衣队虽未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制造侵略华北的口实，但却迫使中国当局接受向日道歉、取缔反日宣传、撤除防御工事等屈辱条件，趁暴乱中，溥仪被劫走。锦州被日军侵占，东北军威信大减，于是，得悉了蒋介石当时执行的是对日妥协绝对不抵抗的政策。所以，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就发动了妄图侵占上海的战争，1933 年举兵入侵华北。

（二）组织闲散游勇扰乱社会治安

天津暴乱失败后，土肥原和三野友吉再次被指派去负责策动“第五纵队”,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的暴乱事件,以达到扰乱社会治安的目的,这就是 1935 年 6 月 27 日的丰台事件。这一事件的前台人物是石友三和白坚武。他们以‘正谊社’为骨干,拟在丰台发动兵变后攻占北平,进而宣布‘华北国’的成立。为此,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在津组织了‘华北正义自治军”;白自任总司令,勾结北平军分会所辖之铁甲车大队的第五、第六铁甲中队，安排潘毓桂在北平城内策应，派遣二三千便衣队潜入东交民巷，令其在铁甲车冲进前门炮击西长安街军分会时，冲杀出来，攻占军分会和其他重要机关。他们还约定驻东交民巷的日军此刻立即出动示威，空军也进行示威飞行。潜在华北各地的反动军队届时一齐暴动，攻占机关。经过一系列周密布置后,6 月 26 日夜间,60 多名日人、汉奸由天津乘快车

到丰台指挥督察这场叛乱。然而，27 日叛乱一发动就遭到了有准备的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将铁甲车六中队长段春泽等三人，逮捕后枪决，一场大规模的暴乱事件又以可耻的失败告终。

丰台暴乱失败后，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派他的干女儿、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来天津再一次策划“第五纵队”的暴乱。

川岛芳子在津广交人士，招兵买马，被她先后收买的有沧县刘佩臣，天津赵德谦、曹华扬、刘秀山，刘锟等为头子的土匪队伍。这帮匪徒后来成了日本侵华的“皇协军”。

在多田骏的主使下，川岛芳子纠合郭希鹏（北平军分会前骑兵师长）、张权本（北平军分会铁甲车材料厂厂长、丰台事件的主谋人之一),以及洪维国、马金城(前东北的下台军人)等于 1935 年 11 月上旬成立了“华北民众自治委员会”。12 月又建立了进行暴乱的“华北民众自卫军”。川岛芳子自任总司令，前热河财政委员会副委员长关庆麟任副司令。其编制计划：第一、第二两军（北平、天津两支特种别动队）辖七个支队。计划在 1936 年元旦前接管天津市县政权，占领平津后再扩大到河北省各地，宣布“华北国”的建立。结果,这帮小丑在 12 月间佩带“敢死队”袖章冲上天津街头狂叫“自治”时，被民众打得抱头鼠窜，狼狈而逃，使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依其暴乱建立“华北国”的锦囊妙计又化成泡影，不得不虎头蛇尾地默默收场。

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建立‘华北国’,不惜一切代价策动了“第五纵队”一次又一次的暴乱，扰乱社会治安，其手段是相当卑鄙的。

原北平市公安局和冀察绥靖公署存有密探所获的关于日伪组织闲散游勇扰乱社会治安等报告，现摘录部分如下：

①1936 年 5 月 16 日

驻屯军辅佐官滨田主张先由设法扰乱平津两地治安入手，藉词自由驻兵，以防中央与共党合作抗日之实现。其办法第一步即藉

以谍报合作抗日为由，要求华北当局表明对中央态度及是否有彻底剿共决心。如无诚意，即唆使日韩浪人扰乱治安，以便藉词保护侨民，进驻日军于保定、石家庄、康庄等地，防备共匪北上。

②1936 年 9月 16 日

日关东军与殷汝耕协议图谋平津计划，决以金钱利用汉奸土匪，扰乱平津治安，造成恐怖状态……组织秘密机关，雇用流氓，乘机向各机关抛掷炸弹（炸弹禁用日本造）。其掷弹代价规定：投入机关内者,赏洋 500 元；投于机关附近者，赏洋 300 元。复指派林世海、李三木为头领，将潜伏津南曹仲桥一带之土匪 300 余人,令其暗藏手枪，陆续化装混匿天津，伺机实行扰乱，并派李文元负责破坏各处电灯、电话等交通机关责任（李系日电灯房工头）。一俟市面混乱时，日方即藉口出兵，并以民众要求自治名义，向各机关请愿。另由赵电、郑燕侯率战区保安队进据天津，援助便衣队等语。

③1937 年 1 月 26 日

某方军部近派前奉天警察厅督察长陈风涛率王广生、祁子臣等百余人，潜来平津及内地各县秘密联络农工、市民、乡团等，拟于绥东战事再起时，即乘机扰乱地方治安，焚烧商店、工厂、学校并刺杀要人等工作。闻已化装学生陆续入关。

（三）暗杀主张抗日名人，挑拨驻军领导人的关系

日本侵华分子为达到侵吞华北的阴谋，还使用了卑鄙的暗杀手段，杀害我国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尤其是社会知名人士。

在原北平市公安局的侦察报告中就有下列记载：

……

1937 年，有日本浪人武田南阳者，奉天津日特务机关命令，在北平组织暗杀机关。分侦察、暗杀两部分，共 14 人。计团长、副团

长、书记、组长各 1 人,团员 10 人,每月经费为 1500 元。其目的为暗杀华北地区有反日意识之要人、中央赴华北视察之大员及抗日分子。其预定计划被暗杀的约有 70 余人。由日特务机关给武田一本名册,上注明被暗杀入之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及特征与照片……武田等并拟接办北平商报,改名为进报社。另觅地址,作为暗杀团之掩护机关。

又,1936 年 7 月间,日本宪兵队长藤某及普安协会总务部长小某二人,奉日本军事机关密令,在津组织一健全之暗杀机关。该二人经积极筹备,于 7 月 1 日在普安协会内成立,定名为正谊社,并在日军某部已领到德制建安式 10 响手枪 500 支,分发 200 支给各社员。该社主旨系暗杀抗日分子。

热河失陷后,张学良下野出国,东北军主要交由当时任河北省主席兼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节制,官兵为数达 17 万人,成了当时华北举足轻重人物,也成为日本妄图分离华北、建立“华北国”首要策反和暗杀对象。

为此,日本特务机关和特工人员策动与于学忠有特殊关系的人物多次鼓动于学忠宣布河北省‘独立”,进而建立‘华北国”,但为于所拒。这激怒了日本特工人员,他们指派白坚武、何庭鎏策划过三次暗杀于学忠的行动:第一次是收买了以王玉珍为首的 30 余名暴徒,欲趁于学忠赴省府(天津二马路)办公途中予以杀害 第二次是收买了于的副官巫献廷与司号官傅鉴堂伺机杀害;第三次是收买被于学忠撤了职的部下曲子才,贿赂副官处勤务兵袁启明在食物中下毒药。然而这三次谋杀的阴谋均未得逞。

日本特务更阴险地把暗杀对象直接指向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如:收买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的司机,对张进行暗杀。由于司机的惊怕而自首,阴谋告吹。接着,特务们就向抗日名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下毒手了。为了使这一阴谋能付诸实现,特务们秘

密探得宋哲元将于 1937 年 7 月 19 日上午 7 时 30 分乘火车从天津返回北平，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个谋杀方案。他们在这列火车必经之地杨村大桥的桥墩安装炸弹,打算重演一次“皇姑屯事件”,让宋哲元与张作霖一样的结局。结果由于计算错误，相差仅仅 3 分钟，火车过桥后炸弹才爆炸，使特务们谋杀宋哲元未能成功。

又，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向我国华北逐步扩大其侵略势力之际，坚决欲把蒋中央政府势力驱逐在河北省及北平天津地域之外。对于他们认为“有害中日两国邦交之秘密机关——蓝衣社、复兴社”等,明确要求取谛,不容存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把侵略中国的战火,点燃到整个华北地区，为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的二十九军首当其冲。在抗战期间，日本人还施展惯用的伎俩，在该军的宋哲元军长与张自忠师长二人之间挑拨离间，制造事端，进行分化二十九军的阴谋，以削弱其战斗力。今将台湾《传记文学》1995 年 7 月明道广撰稿《日本离间宋哲元与张自忠阴谋》摘录如下：

……

日本人在张的面前造谣离间，说二十九军已不听宋哲元的指挥，日本要张出来维持和平。张自忠在这种情况下，由天津到北平。三日后,也就是 7 月 28 日下午，才去见宋哲元。因为当时局势非常紧急，张竟擅离天津军政职守，令宋非常不快。但张的要求非常坚决，甚至掏出手枪，威胁宋尽快离开北平，他有办法与日方和平处理卢沟桥事件。在这种危机下，为了避免同室操戈，宋乃写了手令要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及北平市市长。当晚宋即离平去了保定。

7 月 29 日张自忠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将原政务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改任亲日派张璧、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齐燮元、陈中孚、陈复生等担任委员与要职，最突出的是已被宋去职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